

# 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性

刘 田

**[摘 要]** 主体性力量蕴藏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全过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的内核与实质；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存在差异，形成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样态，主体性思想及其实践方式构成多样性理论样态的重要内容；在“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下，各种风险挑战具有高度的随机性和不可预知性，资本逻辑对人民主体性的侵蚀和宰制愈加深重，厚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性思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中，准确理解并运用其分析和应对当前社会问题，将为中国社会的成功转型提供更加广阔的思路和视野。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哲学；斗争精神；主体性

主体性问题是近代以来哲学关注和研究的重要理论焦点与现实命题，从笛卡尔哲学中独断先验的“我思”主体论、康德哲学中的“主客二分”原则、黑格尔哲学中的“主奴辩证法”到马克思哲学中以实践为根本手段追求主体性自觉的人类解放理想，这些理论成果都对主体性问题给予了高度的时代关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始终伴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释放人民主体性精神的历史进程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理论形态，但都以其科学的主体性思想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彻底的斗争精神。在新时代进一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体性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思想高扬伟大斗争精神，对于持续推进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意义重大。

## 一、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中蕴含的主体性力量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便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先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漫长的斗争历程中，因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各个不同时期的斗争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但中国共产党同各种风险与挑战进行斗争的底气和力量始终如一。在进行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人民群众变革社会的主体性力量，是中

---

刘田，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杭州 310028）。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与国际认同研究”（19ZDA003）的研究成果。

国共产党取得革命事业、建设事业和改革事业成功的核心因素。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同一切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本国的反革命势力作坚决的、全方位的、长时期的和彻底的革命过程中,高度发扬和运用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力量,中华民族由此实现了“站起来”的历史夙愿。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率先经历理性启蒙和科学洗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进的制度和技术优势对中华民族实施殖民式侵略和掠夺,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为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鸦片战争以来,仁人志士自觉承担起民族救亡与解放的历史重任:从人民群众自发参与并发动的“三元里抗英”,到具有旧式农民起义性质的太平天国运动,再到资产阶级保守派发起的百日维新运动,直至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国人民不断探索救国救民与独立自强的斗争道路。然而,无论是封建秩序的维护者,抑或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者,历代革命者的斗争尝试与变革方式都无法根本扭转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现实局面。究其根源在于:无论是自发且盲目排外的旧式农民革命斗争,还是基于分析、比较后进行隔靴搔痒式制度革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都未能行之有效地以科学理论武装人民群众,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自觉进而破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与变革现实的实践效应全面展现。在真理的感召下,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先进群体以积极的姿态接纳、学习马克思主义,随之恩泽的中国共产党得以成立。鉴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抗争史上的宝贵经验,在建党之初共产党人便将科学的指导理论与真正的革命主体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激发人民主体的革命斗争活力并凝结以斗争求解放的思想共识,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力量视为革命斗争胜利的重要法宝。在革命时期,军事斗争在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而发挥人民群众在军事斗争中的主体作用成为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锁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以群众史观审视和分析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的主体作用,并作出了深刻论述,提出了如“兵民乃胜利之本”的精辟论断,指明“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sup>①</sup>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民族独立与人民“站起来”的历史任务,历史已然昭示:人民的主体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力量之源。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重视和依靠人民群众在社会变革中的主体力量,有效化解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断涌现的各种矛盾风险,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变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迅即将工作重心从革命斗争领域转向物质生产领域,着手领导人民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在极短的时间内根本改变了羸弱萧条的国家面貌与民族面貌。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写进国家根本大法,牢固确立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与主体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明确把党的中心工作从阶级斗争领域转向经济建设领域。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是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斗争对象则是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农民自发组织的“分田到户”方式为契机和突破口,开掘和扩展了人民在改革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的可能性空间,“分田到户”的制度尝试对激发农民生产活力、实现粮食增产增收起到了关键作用,从而为建立并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奠定了坚实的实践根基与群众基础。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sup>②</sup>的群众路线,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与首创精神成为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

<sup>①</sup>《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1页。

<sup>②</sup>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09页。

生态等不同领域改革接续开展和取得世所瞩目发展成就的根本动力。“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sup>①</sup>，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改革开放史以及中华民族实现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生动体现了人民群众在改革过程中的主体性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持续进行具有诸多历史新特征的伟大斗争，开启了新时代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擘画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图景。在中国适逢风险与挑战并存的重大历史机遇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坚定人民立场、依靠人民力量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适时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与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精准分析和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进行新时代的伟大社会革命，以不懈斗争的精神改造客观世界。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赢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成就并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极大地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sup>②</sup>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助推中国社会从整体上摆脱了物质匮乏、生活贫困的状态，化解了落后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但在新时代，人民全方位、多样性的生活与发展需要尚得不到充分满足，社会主要矛盾已逐渐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sup>③</sup>，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社会革命的胜利，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并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改造客观世界的阶段性目标。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归宿和评判标准，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改造“主观世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但因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以及“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等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部分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与理想信念遭受腐蚀，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动摇了中国共产党赖以存在的群众基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以进行自我革命，强化党员领导干部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思想、组织、纪律、作风等各领域建设，将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建设始终，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构建起自我革命的科学系统和严密体系，一以贯之地推进党的建设和新的伟大工程。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中心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进行彻底地自我革命并最终赢得伟大社会革命胜利，实现中华民族迎来“强起来”这一历史新飞跃的基本保障。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样态与主体性内容

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斗争的实践及伟大斗争精神中蕴含着深厚的主体性力量，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的主体性思想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理论武器。而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存在差异，形成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样态。纵使各种理解具有差异性，但并未遮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体性思想作为多样性理论样态存在的统一基点和重要内容。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8页。

②参见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学习时报》2011年9月5日。

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历来是哲学界争议不断的理论话题。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实践唯物主义之争，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契机。历史地看，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和惯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反映时代特征的历史形态及其理论回响。苏联时期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只是马克思主义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而非唯一的历史存在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经历本土化和时代化后，形成了具有苏联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表达范式——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表达的苏联传统教科书体系，成为后世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蓝本和依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便开始着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宣传和中国化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后，艾思奇、李达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苏联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为基础，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化整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这一体系沿袭了苏联传统哲学教科书。改革开放后，这一传统被萧前、李秀林、李淮春、夏甄陶和高清海等一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承者与发扬者继承并形成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版本。由于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影响，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较长的时期内，成为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理解，但随着中国社会实践的变迁，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开始突破传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载入史册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标志，学者们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对“实践主体性”和“实践唯物主义”等密切关涉中国改革实践的核心问题展开了哲学论争，深入探讨了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以及实践主体论等相关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地位。以实践唯物主义理解和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学者在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中以中国现实问题为基点创造性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践唯物主义的兴起，对长期居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主导地位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形成挑战，由此引发的“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同纷争和激烈探讨时至今日仍未有定论并时有交锋。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对话与学术争鸣的焦点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的相互关系如何，何者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准确理解？对此大致形成了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sup>①</sup>；第二种观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sup>②</sup>；第三种观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的统一。<sup>③</sup>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种理解路向，可视为从三个不同维度凸显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哲学特征，即实践唯物主义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维度及其首要性和基本性，辩证唯物主义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维度及其革命性和批判性，历史唯物主义则凸显了马

<sup>①</sup>参见吴苑华：《由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实践唯物主义——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之本质内涵和真精神》，《理论探讨》2015年第6期；陆剑杰：《实践唯物主义：彰显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真切之名》，《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安启念：《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实践唯物主义——重读马克思》，《学术月刊》2011年第3期；俞吾金：《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及其当代发展趋势》，《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徐崇温：《用马克思的思想统一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认识》，《哲学研究》1989年第12期；夏甄陶：《论实践的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李德顺：《〈评对实践唯物主义的一种理解〉别议》，《哲学研究》1990年第3期。

<sup>②</sup>参见侯继迎、倪志安：《实证·总体·实践：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三题》，《哲学动态》2018年第1期；黄楠森：《重谈我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看法》，《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10期；段忠桥：《“新世界观”的指向：实践唯物主义抑或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4期；段忠桥：《质疑俞吾金教授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两个说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6期；刘福森：《从实践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探讨》2001年第6期；韩庆祥：《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辨析》，《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sup>③</sup>参见刘福森：《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争的理论实质》，《现代哲学》2015年第4期；王东红：《论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维度及其彻底性和完备性。<sup>①</sup>

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同实践唯物主义的纠纷和讨论中,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抑或是实践唯物主义,都是以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体性思想为前提的。学者们首先强调人在创造自身和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及意义,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思想予以承认和接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内容是辩证法,而辩证法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sup>②</sup>;在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探讨中,无论赞同实践本体论与否,“对主体性的确认并将之作为马克思哲学阐释的基本原则,以强调主体的社会历史地位和作用”<sup>③</sup>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尽管学者们从不同维度理解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体性思想及其实践性运用成为勾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历史形态,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同实践唯物主义之间的共同点和重要内容。

马克思在研究和领会近代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之上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面深化前人的主体性思想,构建起自身哲学的主体性思想——人类解放学说。马克思主义流淌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血脉”,但却一反主体形而上学的先验理论传统,从实践的观点理解和证成人的主体性,开辟出以实践的方式解放主体即人类解放的可行道路,根本上区别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主体性思想。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根本在于从实践的意义上来理解“人”,以“人”这一历史和现实的主体及其实践活动作为研究基点,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聚焦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实践。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承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关涉人的问题为根本点,即以实践为基石的社会历史生活。“因此,这里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人之前的世界是否存在,而是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如何通过作为主体的人来改变这个世界,实现人的解放”<sup>④</sup>,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及其研究和运用,理应从主体及其历史作用的维度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的是抽象的理性主体观,但其并没有否认主体的能动作用;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与其所实现的哲学变革“恰恰是这种在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中得以科学确定的人类主体的能动地位”<sup>⑤</sup>。马克思哲学凸显人的社会性与历史性,但并未摒弃个人的主体性于社会和历史之中,而是着眼于人的主体性及其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的最终实现,从而服从于马克思的人类解放这一永恒主题与价值追求。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现人类解放基本条件的确认,即人对自身主体意识的发现及其内在统一、人对他人主体地位的承认及其相互统一、人对承载自身存在与发展的物质世界的优先地位的尊崇及其相互统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思想的真正意蕴。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和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契合自身时代的理解和阐释,无论其当时的目的为何,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立场如何,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体性内容无疑是必然的。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文化哲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等思想的开掘,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他重要组成部分,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与视界,但诸多研究领域不断出场和深化的前提,仍然源于对主体性问题的精细化研究和耕犁的实际需要。对于以寻求人类解放为根本诉求、理论归宿和核心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不同历史时期的存在形态的演变和更替,其根本是对主体性中某一问题的关注程度的差异而未能全然脱离主体性这一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哲

<sup>①</sup> 参见李秀林等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5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版说明”第2页;杨耕:《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内涵——基于概念史的考察与审视》,《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sup>②</sup> [匈]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0页。

<sup>③</sup> 仰海峰:《马克思资本逻辑场域中的主体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sup>④</sup> 仰海峰:《马克思资本逻辑场域中的主体问题》。

<sup>⑤</sup> 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自序”第2页。

学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革命的,其理论目标是确立人类主体地位和最终实现人类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存在并仍不断开显出不同理论样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景象。但更应进一步把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实践唯物主义的共性和理论智慧,紧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指导意义。

###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性思想的新时代运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同各种困难作斗争的漫长历史中,已经充分展现了其指导作用。“哲学就是人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的理论表现”<sup>①</sup>,其旨在激发、唤醒和提升人对自身主体性的自觉意识以及人对他人主体意识的关注与承认,也就是帮助和指导人类提高其主体活动的自觉性。在“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的转型迈入关键期,各种风险构成的挑战具有随机性和不可预知性,资本逻辑对人的主体性发挥的侵蚀愈加深重。厚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性思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现实斗争之中,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性思想研究当下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中的主体性问题,将为中国社会应对各种挑战提供重要的支撑力量。

人类自诞生以来始终致力于追求和实现自身的主体性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人与世界长期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求解这一矛盾成为人类突破自我、他人和自然的束缚,推动人类进步和实现人类解放的必然任务。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认识客观世界并不断在实践中改造客观世界是人类社会赖以进步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主客体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追求自身解放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实现人的主体性、实现人类解放具有关键意义。然而,当今人类的生存境况表明,人类对于人与外部世界关系问题的理解和解决似乎并不尽如人意。以“唯我论”和“人类中心论”为理论基础的观念长久支配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致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断恶化,从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到恐怖主义盛行,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成为威胁人类存在和发展的“致病因子”。人对待客观世界的非理性观念——征服自然的欲望以及对满足自身主观需求或猎奇心理的极端追求,成为致使人类生存陷入困境和僵局的重要原因。全球性问题的滋生与恶化充分表明:人类对自身与世界的主客体关系缺乏深刻认识和足够重视。恩格斯曾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近代哲学乃至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的论断意味着,从观念和理性层面把握自身赖以生存、发展的外部世界是哲学家乃至全人类始终致力解决的历史任务和永恒主题。从较为普遍的意义上来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或可视为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的关系问题(尽管这一等式,在逻辑上或许并不严密)。从本体论的角度看,作为为人类提供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条件和外部承载的物质世界,自然相对于人类具有绝对的优先意义,但这种优先性并不意味着自然对人类具有绝对的、完全不可移易的支配和统治作用,而是指人类以其存在为自身存在的物质基础。自然的“决定意义”和优先地位,不是体现在物质内容方面,而体现其不因人的存在、认识和实践活动而改变,并要求人类遵循的客观性和规律性等意识内容方面。从认识论角度看,人类能够自觉主动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作为具有自觉性、能动性、选择性、创造性的主体,人类虽然依赖于自然提供的物质基础,但这一物质基础仍有待于人类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力量和创造性思维,进一步转化为满足人类各种需求的物质产品 and 精神产品。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将历史看作是一部人的解放史,即人从各种外在的监

---

<sup>①</sup>高清海:《高清海哲学文存 第3卷 哲学思维方式变革》,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序言”第7页。

护或压抑下逐步解放的历史。<sup>①</sup>但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明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复归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sup>②</sup>人类解放本质上具有双重意蕴，既指向人从“人压迫人”的社会状态中挣脱出来，实现人与人的平等相处和共同发展，达至“自由人的联合体”；又指向人类超越人与自然的长久矛盾甚至对峙状态，以“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是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是人道主义”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式，构建起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人类主体性的彰显以及人类解放的实现，绝非以人类战胜自然或自然报复人类的方式和危险图景加以表现，而是人与人自身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三重矛盾的最终解决，以社会和谐、进步而自然呈现。为此，我们或许至少需要从以下三个维度进一步反思。

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主体创造历史的发展逻辑，提升主体的综合素养并唤醒主体意识，进一步增强中国共产党人现实斗争中的主体性力量，构筑起社会进步的主体基础和主导力量。从哲学层面看，具有主体性的个人并非屈从于完全统一的意识之下，而是发展成一个具有内在矛盾、复杂的群体。在纷繁芜杂的群体社会中，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发掘是社会和谐、进步的基础和前提。人类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诉求，但将实现自我或“为我”作为生存和发展的主要价值准则，并且不承认或很少承认道德的内在规省以及对他人的义务与承诺，则是一种“自恋主义文化现象”<sup>③</sup>，这实际折射出在唤醒主体意识的过程中如何提升主体综合素养问题。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主体的综合素养是影响主体意识觉醒并发挥其创造作用的重要因素。在人类社会由“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进步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时，资产阶级群体及其主体意识的觉醒曾起到决定性作用。尽管在现在看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家所虚构的意识形态及其哲学、道德等观念是应当给予批判和扬弃的，但不应全盘否定其在唤醒和激发主体意识方面的历史作用。“无论是进行认识、实践、审美活动，还是进行评价活动，人始终是活动主体。在人类世界中，对象性活动的种类、层次众多，但其主体都是由人承担。”<sup>④</sup>从整体的角度看，在新时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系列待以解决的问题和矛盾，无论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政治民主问题、社会治理问题或是生态保护问题的解决，人与自身、他人及自然之间三重矛盾的协调，还是对“风险社会”背景下关涉社会主体生存境遇与方式等各种矛盾风险的认知和化解，都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充分发挥人民群体主体力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斗争精神。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sup>⑤</sup>，人既是剧中人，同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实践活动既可以产生正向的积极效应，也存在可能的消极影响。人创造了历史并推动人类社会的长足进步，作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人自身的发展程度直接关涉社会发展的方向、速度、性质和水平。“因此，要改变历史状况，推动社会进步，必须努力使人在实践创造活动中成为实现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自由与必然相统一的主导力量。”<sup>⑥</sup>在现时的条件下，提升作为社会主体的全体

<sup>①</sup>[美]弗莱德·R·多迈尔：《主体性的黄昏》，万俊人、朱国均、吴海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页。

<sup>②</sup>《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sup>③</sup>刘森林：《近代主体观念的社会性重建》，《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2期。

<sup>④</sup>胡为雄：《国内主体研究回顾（1981—2012）》，《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

<sup>⑤</sup>《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6页。

<sup>⑥</sup>陈冲：《主体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现代哲学》1993年第2期。

公民的综合素养,激发其主体意识和自觉,是中国共产党人诉诸社会发展的主体基础和主导力量,是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路径。

其次,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主体能动性与规律性相统一的理论方法,激发中国共产党人以制度思维发挥斗争精神中的主体性力量,建构有效防范未知风险的体制机制,奠定应对转型社会中的未知风险的制度依循。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关于社会历史的总的观点和根本看法的科学理论而存在,“其当代性及当代功能不仅体现在宏观且深度地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动力和机制,探究社会体系的构成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预测社会发展的趋势,为人们的活动提供科学认识方面的指导,还体现在根据人生存发展的主体性要求设定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和目标,阐述对社会发展的期望和愿景,对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各种价值问题做出合理的说明和评价,为人们的活动提供价值依据”。<sup>①</sup>在“风险社会”下,从主体层面或个体层面提升社会整体应对未知事件和突发事件的素质与意识,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务必承担起的一项基础且重要工作,但构建警戒性和预防性的体制机制,或许是能够起着长效性和及时性作用的可行方案。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面临新的社会困境和难题,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的挑战与风险激增。“风险社会”的来临也预示着:纵使人民整体素质已今非昔比,但及时且精准地预测即将到来的各种应激性或突发事件的仍具有较高难度。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在从外部事件的刺激到作出应对的过程中存在着“刺激—主体—反应”的三项链环环节,居于中间环节的“人的主体性”发挥着关键作用。但从以往人类应对突发性事件的历史看,仅凭人的主观能动性无法产生有效作用,主体性并非完全凭借个人自我努力就能成功完成的问题,体制机制对发挥人的主体性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风险社会”中,中国共产党人发挥其斗争精神对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未知情形进行应急已成为一种常态,因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融合“主体性”和“客体性”维度的制度思维,建构对可能衍生的各种矛盾和风险进行应对的体制机制,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思维发挥斗争精神中的主体性力量,助推中国社会在发展中稳步转型的制度依循。

最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思想及“异化”理论,超越资本对人的统治和支配逻辑,廓清人的本质展现的思维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旨趣在于:对统治人、压制人的物化世界的批判、对人与资本之间颠倒的主客体关系的拨正以及对人的异化的求解。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在社会发展的力量已初见端倪并持续高涨,作为以往历史上社会进步主导力量的人,逐步沦为“人格化”资本的奴隶和附庸,原本作为人类主体性确证与人挣脱物质世界束缚的工具性力量——资本,成为人类世界的主宰,人与资本的主客体关系倒置。“主体性的发挥常常导致了一种对主体性的压抑和制度性的驱使,不断制造为我性工具的后果常常是主体自己成了某种力量的工具,改造客体的结构常常是自己成了客体。”<sup>②</sup>资本逻辑构设的物化世界与人的“非人化”结局,似乎正在成为当今世界的“真实”状态,人的主体性走向没落和终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悉数资本及其对人的“异化”与统治,为仍处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现实世界和当今人类社会提供了根本批判武器。面对资本在全球化时代对人类的全面“围剿”,对人类主体地位的全面侵占以及对人类主体力量的全面瓦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唤醒、重建并聚集人类主体性力量的“文化武器”。正如学者在反思资本与人类的错位关系后所发出的呼喊:“在资本逻辑中,如果主体已经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那么结构化的资本逻辑就会取得统治一切的地位,这样一来,我们如何打破资本逻辑的统治?”<sup>③</sup>在资本力量已无可避免地渗入

①陈新夏:《唯物史观价值取向当代建构的前提性考查》,《哲学研究》2019年第2期。

②刘森林:《实践的主体性解释模式批判》,《哲学研究》2004年第5期。

③仰海峰:《马克思资本逻辑场域中的主体问题》。

社会肌体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如何以伟大斗争精神与可能存在的资本逻辑统治社会和人的“异化”力量作斗争,进而保障人民群众在中国社会中的主体地位?答案始终是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在实现主体性的实践呼唤和理论伸张中,其“作为‘世界哲学’的魅力重新凸显出来”,形成“关于现实社会精致分析中所运用的方法和结论,关于人、人的生存与生活、人的本质以及人的解放,关于传统与现实、民族与世界的关系,关于在‘颠覆了’传统形而上学之后所开辟的新的哲学路径”<sup>①</sup>。以实现人的主体性与人的本质复归为理论旨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方法、结论、哲学观及其所开辟的人类解放的全新道路,成功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自身解放,仍将是指引共产党人同追寻自身彻底解放过程中的各种困难作斗争的批判武器。

(责任编辑:蒋永华)

## The Fighting Spirit of the Communists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Marxist Philosophy

LIU Tian

**Abstract:** The power of subjectivity is embedde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practice carried out by the Chinese peopl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us demonstrates the core and essence of the fighting spiri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different theoretical forms of Marxist philosophy have thus been formed. In the backdrop of “risk society”, various risk challenges are highly unpredictable, and people’s subjectivity is increasingly eroded and dominated by the logic of capital. This has made the thought on subjectivity of Marxist philosophy take root in the fighting spirit of Chinese communists. 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subjectivit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dealing with China’s current social problems will provide a broader vision for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rxist philosophy; fighting spirit; subjectivity

**About the author:** LIU Tian is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210028).

---

<sup>①</sup>李广昌:《马克思哲学的中国语境与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10期。